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中国近世文化思潮论丛

丁伟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中国近世文化思潮论丛

丁伟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世文化思潮论丛 / 丁伟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7706 - 8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文化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50.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131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蓝垂华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 25
插 页 2
字 数 455 千字
定 价 9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王 琪 刘 杨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概论篇

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	(3)
中国文化的近世变易	(20)
活着的传统	
——关于传统文化现实作用的若干思考	(39)
再论传统文化的性质与作用	(48)

晚清篇

《校邠庐抗议》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75)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98)
“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	(122)
试析“康学”三源	(146)
解读《翼教丛编》	(165)
晚清国粹主义述论	(181)
20 世纪初的文化自省	(195)

民国篇

裂变年代的文化冲突	
——试论民国初年新旧观念间矛盾的激化	(213)

2 目 录

“五四”前夕东西文明异同优劣之争	(227)
对“伦理革命”的再认识	(266)
对“文学革命”的再认识	(287)
新旧文化能否调和之争	(309)
论《学衡》	(326)
“科玄之争”新解	(368)
新一轮的文化路向之争	(398)
编后附言	(443)

概 论 篇

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

(一)

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近代文化挟军事、经济、技术之优势，排闥直入，大规模地进入东亚文明古国，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强劲挑战，引起了中国人心的剧烈震荡。

时移世异，今非昔比，来势迅猛的欧风美雨，迫使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再也无法照旧陶醉在往日的辉煌之中。从此，关心国事、关心国学的人，便不得不认真考虑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命运这个时代课题。众多有识之士开始严肃思考和苦苦索解：中西文化的大交流，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究竟是祸事还是幸事？是凄凄惨惨的劫难，还是发展的良机？

西学来华，宿儒瞠目。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中国广大知识群，尤其是一向笃信儒学的人士，对于西学的输入给中学造成的威胁，感触最大，忧虑最深。清末著名学者俞樾的一段议论，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士大夫中相当普遍存在的以为中国文化面临废亡危难的这种心态。他写道：

今士大夫读孔子之书，而孜孜所讲求者则在外国之学。京师首善之地，建立馆舍号召生徒，甚至选吾国之秀民，至海外而受业焉。岂中国礼乐诗书不足为学乎？海外之书，译行于中国日以益增，推论微妙，创造新奇，诚若可愕可喜，而视孔子之书反觉平淡而无奇闻。彼中人或讥孔子守旧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议论，汉唐以来未之前闻，风会流迁，不知其所既极，故曰孔子之道将废也。^①

^① 《三大忧论》，《春在堂全书·宾明集》卷6，光绪二十五年本。

清亡以后，像俞樾这样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忧心忡忡而又抱着无可奈何的伤感态度的，仍是大有人在。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作为王氏忘年之交的陈寅恪，正是带着这种对于中国文化命运的哀愁，写下了动情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他在序中写道：

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为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于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酈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所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为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所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演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①

陈寅恪这篇文字，讲的是王国维之所以殉道的缘故，事实上这是通过

① 《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对王国维殉道精神的悼伤，寄托了包括陈寅恪本人在内的为纲纪精神“所凝聚之人”对中国文化的哀思。陈寅恪理智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才使得“纲纪之说，无所凭依”；这种旧有的文化精神的“消沉沦丧”，“不可救疗”，已经成为人力无法阻止的必然之势。明识如此，但是王国维以及陈寅恪这样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却从感情上无法摆脱因这种文化的衰落而产生的痛苦，乃至有王国维与此种文化“共命而同尽”投湖以殉道的事件发生。陈寅恪的悼词并序，写得那样哀思绵绵，凄凄凉凉，显然不单是在悼旧文人，而且是在悼旧文化了。他对于旧文化的依恋之情、伤逝之悲，在这里表达得是真实而坦诚的。也正因此，他把自己文化观念上存在的褊狭、固执、痴迷的一面，也无保留地公之于世了。陈寅恪把纲纪之说看做中国文化固有的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从而认为纲纪之说的“消沉沦丧”，也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劫尽变穷”，从此衰落而永无复兴之日。他在给王国维所写的挽词中，抱着对于民国以来十数年间祸乱不已的极端不满，和对晚清时他所习惯的文化氛围的无限眷恋，用更加哀婉的词语，倾诉着这种文化失落的心曲。对于西方近代文化有着相当了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却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纲纪之说，抱着如此难以割舍的深情，这正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实现革新与进步，是何等艰巨的事业。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何以是在无休止的冲突与争论中进行？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何以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尽气力去克服重重舆论的阻力、挣脱恋旧情感的羁绊？中国文化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每一次改革和每一种创新，何以会招致“破坏传统”一类指责，总会引起“中国文化将被西方文化取代”一类的忧虑？所有这些问题，只要细细品味陈寅恪这样的颇见真心的作品，大体上就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答了。

从俞樾到王国维、陈寅恪，文化情感的传承，脉络是十分鲜明的。王、陈之后，对中国固有文化怀着悼伤的哀思，并进而有复兴旧学之志的，至今仍有杰士时出。由此愈加可以看出，如何在同西方文化的对比中观察中国文化的境遇，确实是一个中国文化面临的时代课题。所以，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不能不继续考虑、认真分析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大交流的形势下中国文化的地位与性能，不能不下力气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现实

价值和未来趋势。

(二)

中国文化热，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缓缓升温。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所蕴含的巨大潜能，以及它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现实价值，越来越成为世人关心的热门话题。至于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里中国文化会在全球范围内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也成了牵动着众多中国人人心的事。有些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势头，现今也觉得不大好等闲视之了。这种中国文化引起世人重视的情况，对于从事研究中国文化、建设中国文化的我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至少它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条件。

由于历史悠久、内容博大，中国文化是一个人们很难研究的繁重课题。什么是中国文化？要想做出回答，下个足以概括其本质特征的定义，至今还是个难题。从 19 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上的先觉人士中，陆续有人在同欧洲文化的对比中试着描述和界定中国文化的种种特性；现时海内外博学的学者们，也还有不少人在继续着这种列举中国文化特性的工作。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来看，他们的这种探讨的劳绩，是很值得尊重的。但是，这种为中国文化定性的方式，往往因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破绽颇多，令人不能不对它产生“似是而非”的观感。所举种种，粗粗望去，似乎也言之凿凿，但是稍做推敲，就不免使人疑窦丛生，发现其中许多论断是立不稳脚跟的。

例如，第一，所举中国文化之若干特性，欧洲文化是不是也具有呢，这就很值得考究。比如说中国文化重伦理，重人文，重和平，重义轻利，重个人修养，重人的尊严，等等，那么，欧洲文化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形成过或没有具备过这样一些特性呢？平心而论，人们所习以为中国文化独具的这些特性，在欧洲文化中也是不难找到的，形态上容或有着很大差异，程度上却不一定处处比中国逊色；仅仅以之为中国文化的特性，实在未免太牵强了。

第二，所举中国文化的特性，放到中国文化整体上观察，常常体现的

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特性，而事实上中国文化往往却又同时存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另一方面或另一种特性。举一掩一，恰恰抹杀了中国文化本质的复杂性。比如许多人把中国文化界定为“静的文化”，但事实上中国文化既有“主静”的传统，同时也有“主动”的传统。“主静”绝非周敦颐、二程之前儒学的本质特征，这是不疑的史实。至少，在“清静无为”的文化信念流布的同时，强奋有为的文化信念也在代代相承着。从“生生不已”、“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奋进精神，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的壮志雄风，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一贯具有昂扬的“主动”的文化特性，何曾深沉到一味“主静”的文化状态中？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当可随处看到，中国人强悍奋发、斗争不息的民风士气，绝不下于西欧。同样，一部中国通史，也证明着把中国人说成只具“重道义轻功利”特性的民族，更是书生迂见。不论从褒义上看，还是从贬义上看，在中国历史上，道义虽屡被崇奉，然而不能不承认功利之欲也屡屡在扮演着历史的重头戏。孟轲、董仲舒一类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在中国普通人的心里究竟占多大分量，恐怕应该做清醒的估计。从消极方面说，虔诚相信理学家“天理人欲”道义准则的人自然是有的，可是以此矫情欺世之徒历来却也比比皆是。无法否认，我们中国历史上，在道义的名义下争权夺利的事，并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支流。从积极方面来说，中国历史上诚然不乏为信念而成仁取义、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志士仁人，但同时中国历史上也颇有一些在功利动机的驱动下，为建立霸图宏业而充满竞争精神的英雄豪杰。甩掉反功利的道学价值观的变色眼镜，可能对我们民族特性会看得明白一些。君不见，现在不是又有不少人在夸奖中国人是天生的善于经商的民族吗？

第三，与欧洲文化相对比而界定中国文化特性的判断，常常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文化作为新特色，拿来与中国资本主义未兴之前的文化特色（而且主要是清末民初的文化特色）相比较而做出。这在方法上就犯了忽视文化的时代背景的差错。不言而喻，就欧洲自身而言，其文化特性在资本主义时期与前资本主义时期，本来就有着明显的差异。比如个性解放、竞争精神之类，无疑就是资本主义勃兴后才突出起来的新特性。以

欧洲资本主义近代文化所具有的突出特性为坐标，来判断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文化的特性，当然包含着许多不可比性。退一步说，把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欧洲文化，做个性质上的比较，亦未尝不可作为加深认识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方法。不过这样做应当明确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必须自觉地看到所比较的双方存在着社会发展程度上的不同这一情况，或者说应当明白两者之间文化上的差异，乃是与具有时代性不同两种社会结构的差异直接相关的。不明白社会制度发展程度差异所造成的两种文化间的巨大落差，而去强行寻求解答中国文化特性的谜底，自然不免闹得阴错阳差了。其实，要想弄清这种单纯与欧洲近代做比较来判断中国文化特性的办法何以不得体，并不是困难的事。只要同时把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也进行一番比较，那么就不难发现原先和欧洲近代文化对比中所界定的中国文化之特性，确实是一桩难以成立的公案了。当然中国文化的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要认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本质特性，是一件严肃而繁难的工作，这绝不能像用筷子吃饭和用刀叉吃饭的差别那样一望即知。研究中国文化特性的工作，20世纪大约只能算是开了个头，现在仍处在很幼稚的阶段上，不自量力而为中国文化特性强作解人，多半不能算是慎重之举。

(三)

中国学人对于中国文化所作的分门别类研究，早已成果累累，为什么一旦要在与外国文化相比较中确定中国文化的特性时，却显得浮泛无据、轻率武断呢？看来这是由于当着把中国文化作为定性的对象时，在认识上已存在着误区。

这种认识上的第一个误区，在于把中国文化当成内容单一、构成单一的文化个体来对待，而完全忽视了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本是包含着众多内容、繁复构成的文化复合体。

海外学人有持“只有个别的具体的文化，而无普遍抽象的文化之说”者，认为普遍性的文化，和普遍性的现代生活一样，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诸如

中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文化，因此文化研究就不应去研究文化的一般通性，而是应该去研究每一具体文化的个性。^① 学者选择某一文化系统为其研究的具体对象，而不去做一般的文化研究，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引以为据的理由，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免欠于周全。

以人类文化为全体，中国文化则是它的一个部分；以人类文化体现的是普遍的文化共性，中国文化自然体现的是具体的文化个性。但是，却不能以此为据，就断言一般“文化”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犹如不能以白马、黑马的存在，而否认马是现实存在，不能以中国人、美国人的存在，就否认人是现实存在一样，不能以中国文化、美国文化的存在，就否认人类文化是现实存在；对一切非文化现象而言，文化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存在。否认普遍性事物或否认事物的普遍性是现实的存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况且，只要把理论加以彻底化，是非曲直就会昭然。“白马”对“马”而言，是部分，是具体，是特殊，而对于“白马”所包含的以牝牡、肥瘦、老小、高矮等各种标准加以区分的白马而言，“白马”则是全体，是普遍，是一般。“中国人”对“人”而言，是部分，是具体，是特殊，而对于“中国人”所包含的以性别、民族、籍贯、年龄、职业等标准加以区分的中国人而言，“中国人”则是全体，是普遍，是一般。关于文化的分析，自然也只能同此道理。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一般文化而言，是“个别具体的文化”，而对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以民族的、地域的、学派的、宗教的诸种标准加以区分的各种“个别具体的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则无疑是“普遍抽象的文化”。否认全体与部分、普遍与具体、一般与个别之间区分的相对性质，其逻辑岂不就会导致人们去把“白马”、“中国人”、“中国文化”，都看成现实中找不到的“理论上的存在”吗？那样一来，人们就无可奈何地只能取面对这匹或那匹马、这个或那个人做研究，而无法去对“白马”、去对“中国人”加以研究和定性了；对于中

^①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3—17页。